

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

崔建英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多民族、人口众多，文化灿烂的国家。全面地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需要广泛地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

从文献资料的角度上看，几乎任何一种东西的现时用场都和原来产生它的目的不一样。《周易》，原是一部向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请求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结果的占卜书，作为文献，却是一部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不可不接触的资料；《诗经》中有一些原是统治阶级祀神祭祖、宣扬业绩的篇章，作为历史文献，却是研究周初经济制度与生产情况不可多得的材料；明清两代的《实录》，原是封建王朝自己给自己纂述的施政大事记，作为历史文献，却是价值高于其它内容类似

的“正史”、“别史”、“编年史”之类的史料；地方志原是地方行政官吏的“资政要览”，作为文献，却成为综合性的地方史料……族谱也是如此，尽管它是适应统治阶级家族或家族中的剥削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作为历史文献，也有它另一方面的用途。

族谱俗称家谱，又称统宗谱、世谱、世牒、支谱、房谱、家乘等等，都属此类。

中国的族谱起源很早。魏晋以来，谱学曾大盛。但现时传世的族谱，多是明清两代和民国期间修的，大体上保持着宋以后族谱的一般面貌，其主要组成，可分为规约、族产、传记、艺文、谱系等几个部分。记载有详有略，文笔有高有低，翔实程度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但由于它的记载是以宗族为中

译，1898年出版）都是宣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时期的政治思想和侵略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则是要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安然就序，并益趋巩固。译者在序文里首先欺骗读者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通商，“固曰为牟利而来也”，“但中华亦何尝不利？”过去外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都是由于“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就是叫中国“赏银割地”，也只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所以中国人不应该“不体天心，不知异国，不敬善人”；中国人若是有一点抵抗就是中国人自己“实有取败之理”。他最后指出：中国人必须服从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所以“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里，外国历史书籍的翻译与出版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時候，必然成为宣传殖民主义的工。1902年，孙瀚继魏源的《海国图志》，编成《海国图志征实》一百卷，他说“《魏志》尚战”，而他的《征实》“尚和”，这在我们今天看，又非常明显，是由于孙瀚投降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尚和”就是不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反把林则徐、魏源认为所必要的国防称为“尚战”了。这就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最反动的封建买办阶级的历史观。当我国民主革命运动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才批判了并且纠正了这种反动历史观。

心,反映的材料比较广泛、具体,在很大的幅度上可以弥补方志和国史的不足。

以族谱为文献资料,应用于历史或文学著述中,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众所皆知的一些例子,如:梁刘孝标广泛地利用当时的族谱作《世说新语注》;北齐的魏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刘知几《史通·正史篇》);北宋时欧阳修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多取材于族谱及总谱;清代的钱大昕补《元史氏族表》,称:“今仿《唐书》宰相世系之例取其谱系可考者,列为表。”等等。近年来,不少省、市在汇编地震史料和考察历史地震的过程中,曾广泛地查阅族谱,从中蒐集到很多宏观记载,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研究领域的开拓,尤其是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整理和研究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时,使用这一部分记载幅度相当宽的文献资料,更有现实意义。

一般说来,族谱中的凡例、家规、族训、族约等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私法的具体记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基层统治单位一般是宗族和地方(都、图)双重的,而宗族实际所能起的作用,要比地方广泛和深入得多。这些包含在「礼」、「训」、「规」、「约」等部分内的私法,就是宗族体现儒家学说维护封建秩序的手段。实质虽同,但时代、地区不同,细节则有差异。探讨和整理研究这一类的问题,在目前传世的文献资料中含族谱而外,是不可多求的。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的记载,一般都不够具体或翔实,其原因是著书立说的人们,大抵不屑于注意生活琐事,专门记载这些的簿书之属,又以不登大雅,绝少传世,而在族谱内有关族产和祠祭等项记载中,却系统而具体地保存了这部分资料。近年来曾有人专就某族祭祀时所用的供品、用具、价格,推论过该地区的生活风习以及某一个时期的物价指数和人民一般

的生活水平。在祭器或族产管理的记载中,还可看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田价、地租、租赋、徭役的差别、状况和变化,以及对佃户的剥削、管理手段。

谱系是族谱中最基本的部分,人或以其除名号世系而外无其它具体内容而忽视之?其实,就民国以前而言,这是比官方记载大为详实可靠的“户口簿”,从中不祇可以估计出某个时期某个地区人口消长情况,而且可以洞悉族姓迁徙始末,这对于了解一地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形成,是极重要的史料。许多台湾同胞,就是从族谱中寻找出他们和大陆同胞的密切血缘关系,和祖国大陆无法分割。某些历史人物的家世、生卒年月等等,也往往从族谱中查出线索或证据。

族谱中所载的人物传记,从史料角度上看,一般说来大多数人与目前已知的大小历史事件无甚直接关联或影响,但人物、事迹多不见于其它史书、方志或诗文集,作为备征性质的史料,也是难得的。艺文部分也是如此,而且往往在客观上形成一乡、一地的风土志。有些族谱中的艺文,包括不少同族人的诗文集,其中有一些诗文集虽曾单独刊行过,但单行刻本早已佚亡了。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而言,现藏族谱并不多,但稍作浏览,已可发现在传记或艺文中有许多不曾见于或不详于正史或其他史书的重要记载,如:元末战乱中湘潭曾遭屠城之始末;洪武初年派遣军队清查登记户口;刘瑾一案审理和处理的经过;明代以市舶太监监督广东廉雷二府采珠之弊政;稍在庄廷鑑史狱之后山东即墨发生的一场牵连颇广的文字狱始末——即与顾炎武有关的黄培诗狱;嘉庆年间北京门头沟煤矿矿主对矿工残酷役使和剥削的实况;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和五月间常州大水灾情实况;陕西郃阳乡俗「射虎」之缘起、发展、形式及演出实况、传统剧目,等等。这些记载的最大特点是皆为执笔人亲身

经历或目睹,绝非得之于传说与转录,这比经过整理加工的材料更为真实与具体。

更有进者我国历史上经历过一个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很深,特点之一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泛滥,思想僵化,固执保守。反映在对文献的态度也不例外。尤其是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这六百年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束缚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之中,高谈心性,不务实际,《五经》、《四书》而外几不知世间尚有何学问。趋时鹜势者只知熟读《四书注》、《性理大全》等书,作为当官发迹的敲门砖。稍通达者,除经史而外一概斥之为杂学。讲究经世致用之学者着实寥寥无几。因此,对文献的概念和认识也极狭窄,即使藏书之家,着重收藏的是:经史、诸子、名家文集,旁及医农、历算。像明天一阁主人范钦那样注意到系统收藏地方志、登科录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家。

本世纪初,由于儒家思想基本崩溃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对文献认识的狭隘性逐渐突破,曾被视为吏胥簿书的地方志、档案公牘以至族谱等等始渐渐被学人重视。解放以后,文献集中于公家收藏,在毛主席重视祖国文化遗产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政策指引下,广大的图书馆工作者,古籍整理和研究人员,曾广泛发掘、征集长期被封建社会冷落弃置的文献资料。族谱是注意征集的对象之一。但曾几何时,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推行文化专制,大搞形而上学,把本来已趋明朗的问题,重新搞混,古籍全被目为“四旧”,族谱之类,更被说成是“地主阶级进行复辟的工具”,收集者、使用者皆遭到批判。流毒之深,至今使一些古籍工作者见“族谱”二字即胆战心惊。1978年4月,图书馆界遵循周总理的遗愿,着手编辑全国古籍善本

书总目,在编辑工作会议上,讨论分类法时,犹不敢为族谱安排相应的类目(注)。现时私家收藏族谱更不敢轻易示人。广东的地震工作者希望利用某地现存的族谱查找历史地震的宏观记载,但不得不先找收藏者“交朋友”、谈心,而后从容说明来意要求借阅对方收藏的族谱,否则就可能使对方受惊,宁可把书毁掉以免节外生枝。这种现状必须及早改变,否则像族谱这类资料丰富但基本上尚未被发掘利用的文献,将被再度打入冷宫,终至大量佚亡毁损。相反,一些其它国家,却正在不遗余力地大力蒐集。我们大家记忆犹新在本世纪初,当国内还未普遍地注意收藏地方志之前,日本人就捷足先登,从我国抢购了大量地方志,至今日本收藏的中国地方志有不少品种国内缺藏,不得不从日本摄制缩微胶卷。人们至今引以为憾,殷鉴不远,当以为诫。

固然,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确实曾出现过农村中未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分子籍重修族谱,利用封建的宗族、伦理观念妄图瓦解阶级斗争,但重修现代族谱和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族谱作为文献资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其道理极简单,正如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不惜牺牲抢救并保存了珍贵的佛教典籍《赵城藏》,决不能认为这和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神婆巫祝复活是一回事。

总之,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事物应当善于作具体分析,不能搞形而上学。对待属于历史文献之一的族谱,也不能例外,应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

注:传统的四库分类法,无此类目,现仅将它列为传记类的下位类也不妥当。族谱是包容全面的“家族史”,并非单纯的传记。大多数同志对此看法一致,但未给它安排相应的位置,担心那样太醒目,惹人议论。